

兩漢全書

第一冊



NLIC2970602877

山東大學出版社

主編
副主編

董治安
劉曉東

王承略

兩漢



第一冊



NLIC2970602877

莊大鈞
胡長青

李士彪
唐子恒

林開甲
王承略

劉曉東

整理

山東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兩漢全書·第一冊/董治安主編. —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5607-4022-5

I. 兩… II. 董… III. 古籍—彙編—中國—漢代 IV. Z423.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003061 號

責任編輯 林開甲 馬 新 馬銀川

美術編輯 牛 鈞

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山東省濟南市山大南路 27 號 郵政編碼:250100)

山東省新華書店經銷

山東新華印刷廠德州廠印刷

880×1230 毫米 1/32 671.125 印張 13010 千字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全三十六冊)7200.00 圓

版權所有,盜印必究

凡購本書,如有缺頁、倒頁、脫頁,由本社發行部負責調換

兩漢全書編纂委員會

主編 董治安

副主編 劉曉東 王承略

委員 (以姓氏筆畫爲序)

李士彪 林開甲 胡長青

莊大鈞 唐子恒 鄭傑文

鄧駿捷 劉心明 劉保貞

前言

——漢代文獻的叢集與《兩漢全書》的編纂

一

漢代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大一統的政治經濟體制全面確立、中華民族傳統的文化心理結構基本形成的時期，在學術史上更是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的重要階段。昌盛的經學、成熟的史學、趨於綜合和演化的諸子之學、繁榮的文學創作以及發達的科技，構成了兩漢文化學術的豐富多彩和博大精深。進一步對兩漢現存文獻給予全面、系統的整理，是學界的迫切要求，也是社會的廣泛需要。

漢人文獻的叢集，早在漢代已經開始。如被視為「總集之祖」（見《四庫全書總目》）的西漢劉向所編《楚辭》（十六卷），除哀集屈原、宋玉、景差作品外，還彙錄了漢人賈誼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隱士》、東方朔的《七諫》、嚴忌的《哀時命》、王褒的《九懷》以及劉向自己的《九嘆》等。東漢王逸著《楚辭章句》，在劉向《楚辭》的基礎上，再增收本人的《九思》一種。至於《史記》、《漢書》（以及隨後的《後漢書》），雖係史著，但在記人述事的

同時，具錄了大量漢人的詩文賦等，實際上爲後人了解和輯錄兩漢時期文獻提供了極爲寶貴的可靠資料。就此而言，稱以上史書爲兩漢文獻資料的淵藪，亦不爲過。

《隋書·經籍志》所載西晉摯虞《文章流別集》，據稱是「自詩賦以下，各爲條貫，合而編之」，應當是一部涵蓋漢人著作在內的詩文賦選編。參照作者《文章流別志論》（二卷）的殘文（見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推想《流別集》所收西漢之文，可能包括枚乘《七發》，揚雄《十二州箴》、《十二官箴》、《解嘲》，王莽《鼎銘》等；東漢之文，可能包括班固《答賓戲》，崔駰《七依》、《達旨》，張衡《應問》，崔瑗《机銘》以及朱公叔、王粲等人的作品。惜乎原書已佚，所收具體篇目今天已經難於詳考。

現存六朝階段選編漢人詩文賦較多而重要的一部總集，是梁昭明太子蕭統所纂《文選》一書。《文選》所收，限於「經」、「史」、「子」以外的「文」，所謂「必『沉思』、『翰藻』始名之爲文，始以入選也」（阮元《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然而其所甄采兩漢時期的詩歌、辭賦和雜文，仍有一百三十首（篇）之多。其中不乏今存此前文獻失收的重要作品，詩類如舊題《李陵與蘇武詩》三首、舊題《蘇子卿詩》四首、張衡《四愁詩》、漢樂府《飲馬長城窟行》、《古詩十九首》等，文類如李陵《答蘇武書》、蔡邕《郭泰碑》、孔融《與曹公論盛孝章》等，賦類如司馬相如《長門賦》、班彪《北征賦》、張衡《歸田賦》、王粲《登樓賦》等，也有更多的詩文賦雖已見於《史》、《漢》或其他現存漢人著作，卻以傳本不同，而具有無可替

代的文獻校勘價值。

梁陳之際，徐陵編《玉臺新詠》，爲「但輯閨房一體」（見胡應麟《詩藪·外編》）的詩歌總集，計收有關「男女閨情」的漢詩三十九首，如張衡《同聲歌》，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嬌饒》，漢樂府《相逢狹路間》、《艷歌行》，古詩《上山采蘼蕪》以及著名的長篇《古詩爲焦仲卿妻作》，都始錄於此。

這裏還值得一提的是沈約的《宋書·樂志》。沈約略與徐陵同時而稍前，所著《宋書》的《樂志》部分保存了一批漢代的樂府詩。名篇如《江南》、《平陵東》、《艷歌羅敷行》、《艷歌何嘗行》、《白頭吟》等，均爲最初見載於此；其餘所收各詩，往往也有助於漢樂府某些篇題或文字的參校。

唐代初期，出於儒家經典傳播的需要，以孔穎達爲首受詔撰《五經正義》一百八十卷，其中《尚書正義》用「漢孔安國」傳，《毛詩正義》用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禮記正義》用鄭玄注；又有與孔穎達大體同時的賈公彥，於《周禮疏》中用鄭玄注，《儀禮疏》中亦用鄭玄注；再有稍後的徐彥，於《公羊傳疏》中用東漢何休《解詁》。這實際上是對漢人的一批經書注解作了一次集中整理，在文獻學史上有其不可忽視的意義。

唐代高宗顯慶三年，許敬宗等編《文館詞林》一千卷，依類編纂先秦以來各體詩文。原書北宋時已不見，清末之際，先後從日本傳回殘本十八卷。收入《佚存叢書》本計四卷，

其中第六百六十二、六百六十四、六百六十八諸卷，依次載有《漢武帝欲伐匈奴詔》、《答淮南王諫伐越詔》、《漢文帝與匈奴和親詔》、《漢哀帝改元大赦詔》等文。收入《古逸叢書》本計十四卷，其中第六百六十五、六百六十七、六百七十、六百九十一、六百九十九諸卷，依次載有《後漢章帝郊廟大赦詔》、《漢宣帝鳳凰集泰山赦詔》、《後漢章帝麟鳳等瑞改元赦詔》、《漢元帝火災赦詔》、《後漢順帝旱災大赦詔》、《漢武帝赦詔》、《漢元帝大赦詔》、《漢武帝責楊僕敕》、《後漢李固恤奉高令喪事教》等文；又卷三百四十八存目，有馬融《廣成頌》一篇。收入《適園叢書》計二十三卷，其中（除與上述兩本重見不計外）第一百五十二、三百四十六、四百一十四諸卷，依次載有《後漢秦嘉贈婦》、《後漢崔駰東巡頌》并《南巡頌》、《西巡頌》、《北巡頌》，《後漢馬融東巡頌》，《後漢劉珍東巡頌》，《後漢王粲七釋》（八首）等文。《古逸叢書》本《文館詞林》所附楊守敬氏尾跋云：「十四卷中略有見於史書、《文選》及本集者，而其不傳者十之八九。」信哉斯言！但令人遺憾的是，巨典缺佚殆盡，原貌畢竟難於全部窺見了。

《古文苑》二十一卷，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五稱：「世傳孫洙巨源於佛寺經龕中得之，唐人所藏。」《四庫全書總目》從其說，則該總集實亦成於唐代。《四庫全書總目》又謂：「《古文苑》」所錄詩賦雜文，自東周迄於南齊，凡二百六十餘首，皆史傳、《文選》所不載。然所錄漢魏詩文多從《藝文類聚》、《初學記》刪節之本，石鼓文亦與近本相

同。」如此，其書已開始具有了輯佚的性質。全書收錄漢詩二十九首，各類漢文九十九篇，漢賦四十七篇。儘管其中雜有少量僞作、殘篇，仍爲普查兩漢四百年文獻提供了可貴的資料和線索。

綜上所述，漢魏六朝以迄唐代，漢代文獻的叢集已經積有相當可觀的成果。此一階段的若干總集和叢著，由于去古未遠，總的說來，大都比較集中地保存了一批可靠的或不盡可靠而久已相傳的兩漢文獻資料，爲後人進一步的叢集工作，打下了無可替代的重要基礎。然而，同樣明顯的是，唐以前之總集與叢著大多帶有選編的性質，還算不上對兩漢文獻之更加系統、全面的輯錄網羅。至於所收部分內容的真僞竄亂，文字的殘缺譌誤，雖不能苛求前人，無疑也是今人在利用這批成果時應當注意考辨的。

宋元時期，叢集前代文獻的工作得到更多的注意，先後出現《太平廣記》與《樂府詩集》。前者把文獻叢集的內容擴展到詩文賦以外，是第一部兩漢迄於宋初之較大規模小說故事的總集；後者則對五代以前的「樂府詩」給予了空前完備的搜集、整理。《太平廣記》采錄小說故事計六千餘則，涉及到的漢人著作，有東方朔《神異經》、郭憲《東方朔傳》及《洞冥記》、班固《漢武內傳》、劉向《列仙傳》、應劭《風俗通》、趙曄《吳越春秋》等；其中雖可能有後人依託之作，總的看來開拓之功應予肯定。《樂府詩集》一百卷，堪稱規模宏大，徵引浩博。在其所分十二大類中，計收漢人作品（包括無名氏樂府民歌和帝王、文

人的詩作）：「郊廟歌辭」三十七首，「鼓吹曲辭」十八首，「相和歌辭」五十二首，「舞曲歌辭」二首，共一百三十二首（按「雜歌謠辭」二類未予統計）。迄今爲止，我們所知道的漢人樂府詩，依然大體限於此一範圍。

另外，南宋洪适編撰《隸釋》二十七卷（并《隸續》二十一卷），前十九卷著所藏漢碑一百八十九種。南宋末年，還出現過一部《百川學海》，全書一百種一百七十九卷，收錄了大量的野史雜說和詩文資料，所集以宋人著作爲多，兼及少量唐以前的典籍。此書見錄的漢代之作雖然僅有蔡邕撰《獨斷》二卷，但編者首開叢書彙纂之風（《儒學警悟》略早於是編而規模很小），對於明清時期漢代專書的叢集，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二

明清以來，隨着文化學術事業的發展，以及圖籍整理和刻書、印刷水平的不斷提高，古籍的收集與保存愈益受到重視，漢代文獻叢集的工作也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主要標誌，在於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陸續出現集中彙收漢代專著的大型叢書。這裏首先應當提到的，是元末明初陶宗儀編輯的《說郛》一百卷。《說郛》采錄兩漢經解經注（包括部分緯書）、雜史小說以及各類子書共計四十種，涉及方面之廣和收羅著作之多都是空前的。不足之處，一是體例不

嚴，像子書之類收王充《論衡》而不取賈誼《新書》，野史之類有《吳越春秋》而不見《越絕書》，都未免有一定的隨意性。二是選文多用節錄的方式，只存其大概，也影響了叢書功能的充分發揮。

明萬曆間程榮輯《漢魏叢書》，彙錄集部以外的專著三十八種，上起兩漢，下迄六朝；計收漢代著作爲「經籍」九種，「史籍」一種，「子籍」十七種，共二十七種。稍後，明何允中輯《廣漢魏叢書》，彙錄各種專著八十種；計收漢代著作爲「經翼」十二種，「別史」五種，「子餘」十四種，共四十種。再稍後，清乾隆間王謨輯《增訂漢魏叢書》，彙錄各種專著九十六種；計收漢代著作爲「經翼」十三種，「別史」七種，「子餘」十八種，又「載籍」七種，共四十五種。這套叢書，程輯既有較好的基礎，復經何、王兩度增補，義例明確而收羅相當廣泛，至今仍多有參用價值。

性質相類的叢書，還有明隆慶間吳琯輯《古今逸史》，收錄正史以外的典籍五十五種，其中漢人著作十五種；明末葉紹泰輯《增訂漢魏六朝別解》，收錄漢人著作經部十種，史部三種，子部十七種，集部十五種，共四十五種。至於清《四庫全書》的纂修，幾乎囊括此前歷代主要典籍，漢人著作亦多備於此，茲不詳述。

其二，專事輯佚之叢編的紛紛刊行。兩漢文獻輯佚之風，如上所說，《古文苑》已發其端。南宋王應麟作《詩考》，彙收漢「三家《詩》」的遺說，於一個方面標示此風的不衰。明

代孫穀輯《古微書》，是現存最早一部緯書文獻的彙編。其書收錄資料均不注明出處，所錄緯書三十六種，多數當爲漢代古籍。清代嘉慶間侯官趙在翰輯成的《七緯》一書，共集緯書三十七種，也應多爲漢人之作。是書選材比較嚴謹，其中首收《易緯》八種，又一一注明材料的來源，都是高於此前同類叢編之處。另清人孫堂輯《漢魏二十一家易注》三十四卷，收漢代注《易》之作八種。此類專收兩漢經解經注的佚書，清代尚有多種，難以縷述。

清乾嘉之時洪頤煊所編《經典集林》是綜合類輯佚叢書，收漢人經、史、子等各類著作十五種以上。與此大體同時，王謨編《漢魏遺書鈔》，收所謂漢人「經翼」之作五十三種。此後，清人馬國翰編《玉函山房輯佚書》，收漢人佚書計「經編」一百零二種，「史編」一種，「子編」三十種，共一百三十三種。清黃奭編《漢學堂叢書》（後易名《黃氏逸書考》，有增訂），收漢人佚書計「經解」三十五種，「子史鈎沉」十九種，共五十四種。此類輯佚彙編的出現，大有助於人們對兩漢文獻的全面了解和更好利用。

其三，相當一批專輯別集與彙纂子部專著之類叢編的陸續問世。漢代尚無本人自編的別集，歷史上流傳過的漢人別集均係後人纂編，或爲後人所補輯。明萬曆、天啓間汪士賢輯《漢魏諸名家集》，與稍後的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即《漢魏六朝一百三名家集》），是漢人別集彙編中之較早而重要的兩種。前者輯收漢人別集五種，後者輯收漢人之作二十一種，褚少孫、王褒、劉向、揚雄、劉歆、馮衍、班固、崔駰、張衡、李尤、馬融、荀

悅、蔡邕、王逸、孔融、曹操、陳琳、王粲、阮瑀、劉楨、應瑒等人的諸多別集，第一次被彙錄於此。清末丁福保輯《漢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收漢人別集十五種，增收了司馬相如、司馬遷、鄭玄、徐幹數家，其餘沒有超出張溥所輯的範圍。

子部專著彙纂之類，自明以來估計不下數十種，收集漢人著作較多的有：周子義等所輯《子彙》，收《孔叢子》、《賈子新書》、《陸子》（陸賈）、《小荀子》（荀悅）、《黃石公素書》等五種。胡維新輯《兩京遺編》，收《新語》、《賈子》（即《新書》）、《春秋繁露》、《鹽鐵論》、《白虎通》、《潛夫論》、《風俗通》、《中論》、《申鑒》等九種。歸有光輯《諸子彙函》，收漢人子書二十二種。清光緒年間崇文書局所輯《子書百家》（後易名《百子全書》），收漢人子書「儒家」類十二種，「兵家」類二種，「術數」類二種，「雜家」類六種，「小說家異聞」類三種，又漢人舊注三種，共二十八種。此外，還有光緒間浙江書局輯《二十二子》，收漢人子書四種，漢人舊注二種，共六種；光緒間鴻文書局輯《二十五子彙函》，收漢人子書四種，漢人舊注二種，共六種，等等。民國時期，則以國學整理社輯《諸子集成》影響較大，其七、八兩冊收漢人子書七種，六、七兩冊收漢人舊注二種，共九種。

其四，單篇詩文賦的整綴，出現了各個門類之更趨全備的叢集。詩類，明代嘉靖間馮惟訥編《古詩紀》一百五十六卷，其正集收由漢至隋的古詩一百三十卷。清沈德潛編《古詩源》十四卷，收漢詩（包括歌謠）兩卷。丁福保編《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五十四卷，在

《古詩紀》的基礎上又有所增刪，收漢詩（包括謠諺）五卷總計三百八十首。今人逯欽立纂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網羅放佚，訂正譌誤，收有漢一代各種古詩、短歌、樂府、謠辭、諺語等，共四百首以上，是爲集此類叢集之大成。

文類，明人梅鼎祚編《西漢文紀》二十四卷、《東漢文紀》三十二卷，是空前全備的漢文總集；然而選材上「殊無義例」（《四庫全書總目》語），加以往往失於考辨，「真僞互陳」，是以流傳未廣。清人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其中，搜羅兩漢階段各種現存單篇文章（包括殘篇），兼及一些史論、子書的輯佚，總共達四千篇左右，內容之豐富遠遠超過了先輩同類之作。

賦類總集歷來不多，清康熙間陳元龍所輯《歷代賦彙》是值得提出的重要總集。其書按內容分類編纂朱明以前的賦作，漢賦的名篇多彙集於此。又上述嚴可均《全漢文》兼收漢賦作家七十人左右，漢賦作品二百五十餘篇。今人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輯校《全漢賦》，收集兩漢賦作（包括殘篇）以及非以賦名篇而實爲賦體的作品，總計九十三家、三百一十九篇（含存目三十九篇）。可以說，這大約就是今人所能見到漢賦作品的基本數字了。

由此可見，明清以來漢代文獻的叢集工作，作出了多方面的積極開拓和重要貢獻。上述各種總集和彙編，有的首次把某類、某個方面的文獻資料集爲一編，網羅放佚，廣收博

采，筆路藍縷，其功不可沒；有的借鑒先輩而後來居上，在資料收集的豐富性和科學性上達到了新的水平；也有的在前人基礎上，拾遺補缺，糾謬正誤，爲漢代文獻叢集工作之進一步走向完善不斷鋪平道路，或者在文獻的發掘、編集的體例、文字的考訂等方面，作出了努力，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但是，也應該看到，這些總集和彙編，不論是以專書爲網羅對象，或者以輯佚爲全部內容，還是專輯別集與彙纂子書，或者是單篇詩文賦的某種類編，其共同的編纂特點，在於各守其類。好處是學術專門性強，相對而言便於某個具體方面的查用，而同時帶來的不足，則在於各種叢編之間學術取向不盡一致，質量參差不齊，特別是不可能從總體上如實反映兩漢文獻的完整面貌。

而且，歷史的發展總是後出轉精，過去的各种叢集，儘管作出過可貴的學術貢獻，今天看來則難免存在諸如收羅不全或考訂欠精之類的缺點，比如，各種叢書（包括子書彙編）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缺編、漏編的現象。以傳統「經部」而論，有關《詩》、《書》、《易》以及「三禮」、「三傳」之漢人的舊注，就不曾被一無缺漏地保存於任何一部彙編。「史部」典籍像陸賈《楚漢春秋》、劉向《列女傳》等，「子部」典籍像桓譚《新論》、嚴遵《道德指歸論》、汜勝之《汜勝之書》等，也存在進一步加以整次的必要。至於漢人別集的新編，輯佚書的增補，事實上都有不少可做的工作。再比如，過去叢集中關於文獻材料的真偽、典籍時代的

先後，時亦有判斷失當之處。以叢書為例，就有某些託古之作被視為古人原著，像《神異經》、《別國洞冥記》、《漢武帝內傳》，分別被當成東方朔、郭憲、班固的著作；某些先秦古籍，則被看作作出於漢人之手，像《穆天子傳》、《逸周書》（《汲冢竹書》）即是。又比如，傳世的輯佚書往往是從各種類書摘引資料，而有的類書本身徵引文獻失於覈查，疏誤自難避免。

還應該看到，一些彙編本不注意一定文獻底本的選擇和必要的文字校勘，如流行頗廣的《百子全書》、嚴氏《全漢文》等，這方面存在的問題都比較明顯。此外，也有若干總集義例稍亂，對舊注舊解的選用有某種隨意性。如《法言》一書，《漢魏叢書》等三種均兼收宋人宋咸注，《百子全書》不收宋注；《申鑒》一書，《漢魏叢書》等三種均兼收明黃省曾注，《百子全書》不收黃注；而馬融《忠經》一書，《百子全書》收鄭玄注，《漢魏叢書》卻又不收鄭注。如此等等，顯然並無共同遵循的客觀標準可言。

三

新纂《兩漢全書》是一部規模空前、總括兩漢一代現存文獻的大型叢編。這部大型叢編的編纂，從歷史承襲的角度來看，無疑是兩千年來漢代文獻叢集工作之自然延續與合理發展，因此新的編纂實踐必須努力借鑒、利用自漢以來一切有關文獻整輯工作的積極成果

和寶貴經驗，這是不成問題的。但同時，《兩漢全書》既然面臨新的歷史需要，又是囊括一代文獻，與此前以叢集部分漢代典籍資料為內容的一切總集、彙編畢竟有所不同，《全書》的編纂又顯然應當具有自己總體的指導思想和具體的學術要求。

首先，《兩漢全書》突出「力求其全」的總體特點。要求是，凡屬西漢高祖元年（公元前二〇六年）至東漢獻帝延康元年（公元二二〇年）這一歷史階段的所有文獻，舉如各種專著、別集、單篇詩文賦，以及經籍傳注、小學著作等等，包括佚文殘篇，悉予彙錄，按照既定體例統一整理、編排（石刻簡牘部分擬另作處理）。

具體說，如專著類，除彙總並統一整理已有叢書所收漢人著作外，再行增輯若干新編，像陸賈《楚漢春秋》、桓譚《新論》、嚴遵《道德指歸論》、劉珍《東觀漢紀》等。又如，傳世漢人別集四十餘家，多為明清學者采摭羣籍編就，繁簡有別，體例不一，今一律逐條重考《史》、《漢》、《文選》、《御覽》等古籍原文，彙成系列新編，有較多增補。此外，在充分利用前人輯佚成就的基礎上，對現存漢人單篇詩文賦作系統整輯，同樣可以有較多的訂補。

再如漢人為多種古籍所作的傳注，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卻歷來缺少統一的整理和集中的彙編。按漢人傳注有不同類型：其一是先秦經籍由漢人注解，而注文稍詳或有所發揮者。像《毛詩故訓傳》、鄭玄《毛詩傳箋》、趙岐《孟子章句》、王逸《楚辭章句》等。其二是先秦古籍由漢人注解，而注文較簡僅限於字詞釋義者，像高誘《戰國策注》、高誘《呂氏春